

周仲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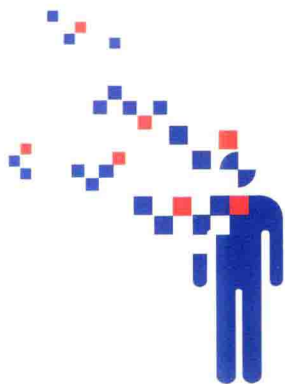


赢取教育红利

中国人口质量转变初论

WINNING
EDUCATIONAL DIVIDENDS

STUDY ON
DEMOGRAPHIC QUALITY
TRANSITION



赢取教育红利

中国人口质量转变初论

WINNING
EDUCATIONAL DIVIDENDS

STUDY ON
DEMOGRAPHIC QUALITY
TRANSITION

周仲高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赢取教育红利：中国人口质量转变初论 / 周仲高著

．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

ISBN 978 - 7 - 5201 - 2655 - 7

I. ①赢… II. ①周… III. ①人口教育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2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3075 号

赢取教育红利：中国人口质量转变初论

著 者 / 周仲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许秀江 王婧怡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张 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5 字 数：15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655 - 7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摘要（代序言） |

随着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转变的研究逐步“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必须了解并遵循人口发展规律，按人口变动规律来制定战略规划。人口转变规律就是人口变动的一个基本规律，需要结合中国人口国情进行深化研究。人口转变是一个过程，不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人口转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差异在于人口转变所处的变化阶段及其发展态势。在人口变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划分构成了人口转变的具体内容。在我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较丰富，且观点不一，但缺少人口质量视界的人口转变研究成果。事实上，人口转变同时蕴含着“量变”与“质变”。在人口转变中，人口的质量也在发生转变。因此，从人口质量视角切入，提出人口质量转变的分析框架，梳理我国人口转变的轨迹，论证人口质量转变研究的合理性及意义，对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深化，合理解释人口转变后的“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的战略机遇期，并对我国最终实现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目标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本书共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为概述，即对本书相关的宏观背景、核心概念、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意义给予说明，框定了本书研究的对象范围。第二章为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实证分析。本章着重研究教育因素在我国人口转变中的变动规律，以及它对我国人口转变的具体影响。第三章为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理论框架。本章在梳理世界人口转变

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实证探讨了我国人口转变的模式，并从教育学视界出发，根据教育因素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机制，探讨教育学视界下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体系，提出人口转变的教育衡量标准，并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可能拓展方向进行思考，提出了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基本框架。第四章为赢取教育红利的政策建议。本章在界定教育红利概念的前提下，对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教育红利进行估算，并据之提出要抓住累积教育红利的关键时机，充分利用教育红利的战略机遇期。

本书的核心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了世界人口转变中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的一般规律。第一，从世界一般情况看，人口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越低，出生的预期寿命越高。第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口转变的完成。第三，世界人口数量转变的完成过程，也是世界人口质量提升的过程，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第四，根据世界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的经验模型，当人口转变完成时，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致为7~10年。

二是研究了我国人口转变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一般规律。第一，我国人口数量转变与人口质量提高同步进行，基本符合世界人口转变过程的一般规律。第二，我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快，时间短，政策干预性强以及转变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速度，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滞后于世界一般规律条件下人口转变所处阶段对应的水平。第三，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滞后性在不断减弱，人口受教育程度已不断趋向一般规律，我国人口转变的教育指标正按理想的方向发展。第四，我国人口转变完成得不彻底，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工作依然艰巨。若把人口转变完成看成一个综合性的阶段系统，2002年世界一般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4年，而我国实际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2年，滞后于世界一般水平。

三是提出了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基本框架。第一，世界人口转变的基本原理都是一致的，即由高位平衡转向低位平衡。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

究通常是结合社会发展进程来考察的，其归因由单一走向多元，但综合性的解释仍在争论之中。人口转变理论在方法论上由定性走向定量，人口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人口发展由以死亡率为主向以生育率为主的转变过程。第二，与世界一般模式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模式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口死亡率下降速度十分快，早在前现代阶段，我国人口死亡率就降低到很低水平，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之上；二是人口的出生率存在波动性，受强控型的政策调控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但仍存在较大的反弹空间。第三，把教育因素纳入人口转变模型，即提出人口转变的教育判断标准，这既可以说是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补充，也可以看成综合考虑到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转变理论。因此，若某一国家的人口数量转变已经完成，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尚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就说明此国的人口转变还不彻底，人口质量没有得到同步的提升。若基于教育学视界对我国人口转变进行考察，2002年我国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的观点是成立的。第四，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方向有三。一是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即其研究视角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多元走向综合，这样对现实人口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更强。二是探讨人口转变完成后的发展方向（即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代）。三是研究具体的转变模式。人口转变理论在具体国家的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在人口转变的多种影响因素中，某一因素可能在某一国家起主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作用甚微。

四是估算并分析了中国人口质量转变后的教育红利。第一，教育红利指在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的一个时期，在教育红利期内，受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教育红利的提出，丰富与深化了人口转变理论，也将是对积极的、扩大的教育投资战略正确性的历史性验证。第二，教育红利的获得，在时间上显然要长于人口红利，而且可以说它是无时间限制的，教育红利更多的是教育投资的结果。第三，教育红利的获得是一个持续增进的过程，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数量界限。教育红利的获得与人口质量转变的

完成是同步的，人口质量转变的完成标准也可以作为教育红利获得（或开始）的标志，即人口质量转变（即当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0年）完成，就标志着人口进入教育红利期，教育红利开始获得并持续增加。第四，据估算，2000年，我国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1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2年，到2050年，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升到9.58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到13.24年。从劳动力人口来看，2008年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到2035年左右达到高中毕业水平。从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看，2000年呈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到2050年，不同年龄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别已很小，劳动力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第五，我国人口转变完成的下限标准在2005年左右已基本达到，且人口数量转变的标准在2005年左右也已基本达到，但离人口质量转变的标准尚有较大的差距，要达到人口质量转变的标准，即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8年，仍需较长的时间。第六，要保证教育红利的获得，需要从人口、教育与社会三个方面确保，在教育方面要优先发展教育和优化教育质量与结构；在人口方面要加强对人口变动规律，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规律的把握；在社会方面则要形成重视教育的氛围，确保教育红利的功效顺利发挥。

本书的学术价值有二。一是对人口转变理论本身的梳理与评析。本书通过评述国内外人口转变理论的派别流变，提炼了世界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线索，并据之考察我国人口转变的现实过程及理论学说，从学理上为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系统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二是从教育学视界下重新考察了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并据之考察了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教育因素，提出人口质量转变的分析框架。本书根据世界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把人口受教育程度纳入人口转变的一般过程，并形成了人口转变的教育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转变质量完成滞后于数量完成的判断，并建议要抓住教育红利的历史机遇等观点。

本书的应用价值也较明显。一是为进一步认清我国人口形势提供了教育学的视界。我国人口数量大、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在较长一段时期

内不可改变，虽然我国已完成了人口的数量转变，但因人口的质量转变还没完成，我国人口转变的完成是不彻底的，而且有可能会反复。二是估算并论证我国教育红利获得的可能性。本书建议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同时，注重“教育红利”的累积，随着我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完成，我国将进入教育红利期，因此，抓住当前时机，积极发展教育，将决定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实现，并对我国最终实现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在模式案例与拓展应用方面尚欠深化，后续研究方向有二：一是通过概括与总结更多发达国家人口质量转变的具体模式，建立人口质量转变的模式案例，并据此进一步深化对人口质量转变规律的认识；二是在我国教育红利的拓展与应用方面尚需具体化，结合我国人口数量转变后的形势，与其他学科的知识链接，通过构建更多的指标，以更清晰的结果展示当前关注教育红利的必要性与紧迫感。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主要概念界定	4
第三节 文献述评	9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	18
第二章 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实证分析	21
第一节 教育因素的测度	21
第二节 教育因素与人口转变的关系	28
第三节 中国人口转变中的教育因素测度	48
第三章 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理论框架	57
第一节 人口转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57
第二节 中国人口转变理论及其独特性	68
第三节 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分析框架	74
第四节 人口转变理论的演进及态势	82
第四章 赢取教育红利的政策建议	88
第一节 教育红利	89

第二节 教育红利的估算	95
第三节 赢取教育红利的政策建议	119
参考文献	132
附 录 本书的基础数据	140
后 记	155

第一章 概述

本章就书稿相关的宏观背景、核心概念、相关文献、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意义等作一总体概述。人口转变是一个过程，不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当前我国人口正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在人口变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划分构成了人口转变的具体内容。在我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较丰富，且观点不一，而单独从教育学视界分析人口转变的文献几近空白。事实上，人口转变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因素。在人口转变中，人口的质量（如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在发生转变。尽管国内综合研究教育与人口关系的文献日渐增多，但研究思路侧重于宏观的关系研究或具体的数量论证，尚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因此，从教育学视界分析我国人口转变的变迁，梳理中国人口转变的轨迹，论证教育学视界下我国人口转变的合理性及意义所在，对我国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深化，合理解释我国人口转变后的“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的战略机遇期，并对我国最终实现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目标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本节首先提出问题，从一个初入人口学研究领域的训练者角度，认为人口研究需要对问题意识给予特别关注，对问题的研究需要一种自觉

的意识与反思的习惯，问题意识的形成，是对学术研究自信确立之开始。由问题意识导入，提出本书力求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问题意识

作为一个刚跨入人口研究行列的训练者来说，他对所面对的世界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他对每天接触的书刊、数据、调研报告、学术活动以及同行的讨论都是熟悉的，但正是在这些熟悉的形式下，他每天面对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得复杂，但同时又是如此得美妙。学术魅力的根源不在于他所面对的熟悉世界，而是他所未知的陌生世界。正因如此，对于一个刚跨入学术行列的训练者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熟悉的世界，在熟悉的世界里纵情地漫游，却总是无法叩开陌生世界的大门。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能提出什么问题?我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一连串的疑问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从而构成了他的“问题集”。学贵疑，疑则进。随着“问题集”容量的不断增大，“问题集”里的问题又出现了问题。我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而不那样提出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何在，有无价值?也就是说，问题自身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事实上，在“问题集”里众多的问题中，有的是真问题，有的是伪问题，也有的问题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问题，还有的问题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于是，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还得进一步去辨别问题。

辨别问题包括确立判断问题真伪的标准和确立问题的分类标准两大方面。一方面，问题真伪的判断标准要依据实践需要来界定，尽管有些理论问题无法直接用实践来检验，但也可以通过逻辑的检验达到要求。从终极意义上说，实践是判断问题真伪的唯一标准，而从现实方面考虑，判断问题的真伪存在一个时间的间隔，问题的真伪并不能立即体现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要依据现实的情况，发挥人类理性的作用，跨越这个时间间隔去预测后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确立问题的分类标准对于辨别问题也不可忽略。所谓确立问题的分类标准，也就是厘清主体是从哪个层次提出问题以及提出什么类

型的问题。从主客体的关系来说,“问题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阻隔和中断(受挫)”。^①问题是主客体之间发生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至少存在三个不同层面:一是事实认知关系;二是价值选择关系;三是实际操作关系。对应于这三种关系,在理论上也存在三种问题(即问题的分类):一是事实问题,它关注的是“实然”判断,要求主体保持价值中立;二是价值问题,它关注的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的配位,是一种“应然”判断;三是操作问题,它关注的是主体对客体的干预,也是主体进入实践环节的途径。^②基于此种问题分类,在提出问题时,就需要明晰准备提出什么类型的问题,在辨别问题时,也得明晰问题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同样,在解决问题时,不同类型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期待方案。但需要说明的是,在事实层面,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并非一定要如此一一对应地加以划分,而在研究层面,这种划分对研究思路的澄清还是大有裨益的。

具体到我国人口研究领域,我国人口研究的最明显特征是它的务实性与政策性。人口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程度成为衡量其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据此,以现实问题为主要类型的研究,它实际上是以操作性问题为主,而对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关注较少,这一点与我国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是一致的。^③

二 主要问题

根据上述的问题意识,本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人口转变研究的现状如何。它要求对现有研究给予正确解读,明确研究的起点,避免重复劳动。第二,教育因素在人口转变中有无作用,若有,又有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着重于发现与论证教育因素在我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机制。第三,把教育因素纳入人口转变研究有什么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这是对书稿研究的价值给予说明,具体

① 周作宇:《问题之源与方法之镜——元教育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② 周作宇:《问题之源与方法之镜——元教育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③ 李竞能:《21世纪中国人口理论研究的展望》,《人口研究》1998年第2期。

内容包括如何进一步丰富我国人口转变的理论研究。第四，我国人口转变完成后，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作何判断，教育因素对人口转变有什么具体的现实价值等。第五，认清上述理论问题，对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甚至经济社会发展有何价值意义，从政策角度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做好怎样的预案等。

第二节 主要概念界定

概念的界定是所有分析的基础，社会科学中常常存在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其中很多观点均由其所依据之核心概念的分歧所致。正因如此，在行文伊始，把本书研究所依据的核心概念进行基本界定就显得很有必要。在全书中，与书稿内容紧密相连的核心概念有人口转变、教育、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下面分别对这四个基本概念给予说明。

一 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 (demographic transition) 这一概念最早由 W. S. 汤姆逊 (Thompoon, 1929) 提出，它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后经 A. 兰德里 (Landry, 1934)、F. 诺特斯坦 (Notestein, 1949, 1953) 等发展、完善，形成了解释人口历史变化的经典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变的本意是指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① 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过程，是把人口再生产与外界变量（主要是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联系的一种理论解释。

人口转变理论自形成至今，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它在解释人口变化过程的各种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另外，作为一种学说，它

① 李辉、于钦凯：《中国人口转变研究综述》，《人口学刊》2005年第4期。

也在不断经历着修正与补充，同时也接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与争议。

人口转变理论自提出之后，分别经历了由汤普森和诺特斯坦的二阶段模型、诺特斯坦和寇尔等人的四阶段模型、C. P. 布莱克的五阶段模型等不同的变种，但上述模型均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起点（高位静止）和终点（低位静止）的分析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口转变的本质就是由“高高低”这一阶段向“低低低”这一阶段转变。二战以后，人口转变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其中诺特斯坦和寇尔等人的人口转变理论模型影响最大。诺特斯坦在修正自己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把人口转变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形成了四阶段模型：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以前的阶段，出生率保持稳定的高水平，死亡率也处于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且有波动，即“高高低”，属于高位静止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出生率基本上维持不变，死亡率开始下降并且逐渐加快，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上升；第三阶段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下降速度滞后于死亡率下降速度，因此，这个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在第二、第三阶段，人口发展阶段均为“高低高”；第四阶段是完全工业化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低，甚至在零或零以下，人口发展进入“低低低”状态，属于低位静止阶段。^①

人口转变进入“低低低”状态之后，人口的发展过程又形成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内学者更多地称之为“后人口转变”），与前一阶段的人口转变（学者称之为“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较，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当人口处于“低低低”状态之后，妇女的生育率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的出生与死亡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平衡，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静止人口状态。^② 一般来说，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原因，

① 李建新：《人口转变新论》，《人口学刊》1994年第6期。

② [英] 德克·J. 冯德卡：《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刘恩靖译，《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学界主要归因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同时，文明、理性、世俗化以及文化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产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而且更多地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Van de Kaa（1987）认为，“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表现为四个重要的转移：第一，从婚姻的黄金时期转向同居的破晓；第二，从孩子为王的时代转向以伴侣为中心的时代；第三，从预防性的避孕转向自我实现的避孕；第四，从单一家庭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家庭户模式”^①。

二 教育

教育概念是一个使用十分普遍的概念，在教育学上，从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②

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广义的教育难以测度，在一般文献中出现的教育，常常是指学校教育。在人口学中，对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研究一直受到较多关注，我国自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起，就在普查项目中对人口受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相关的领域已初步形成，并在教育与人口的交叉领域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教育人口学。^③

三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并于近几年在国内迅速流传。“人口红利所指的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① 蒋未文：《“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人口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③ 田家盛：《教育人口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①②③} 具体来说,就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深受其累,这时会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之后,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④

由上述可知,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状态或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可能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产生“红利”的现象。但正如都阳所言,人口红利能否获得并不具有必然性,人口红利的获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处于人口红利期并不一定能获得红利,它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的共同支撑。^⑤“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从‘人口机会窗口’中受益,必须要做的是对传统的相关发展战略做出相应调整。人口转变

① 陈卫、都阳、侯东民:《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Bloom, David 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 1998, pp. 419 - 455, Argue that it accounts for between one forth and two fifths of the "miracle".

③ Bloom, David E., David Canning and Pia Malaney,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 2000, pp. 257 - 290.

④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陈卫、都阳、侯东民:《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